

206413

基本館藏

政治經濟學講義社會主義部分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 的分配

苏星編寫

內部資料，供討論用



F40192

中國人民大學

1963年·北京

政治經濟學講義社會主義制分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 的分配

苏星編寫

12
46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1953年·北京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的分配
苏星编写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1—13,017册 20,000字

统一书号:4011·211

定价(6):0.08元

412
446
206413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的分配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根本问题，是力争高速度。要高速度，就必须恰当的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就是说，必须注意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 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以，必须认真研究这些问题。

一 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

社会主义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再生产也是一样，它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矛盾统一体。

从物质资料生产的角度上看，再生产的结果是一国的年总产品。这个总产品归根结蒂是为了供消费（生产的消费与个人的消费）之用的。在生产到消费中间，它将经过分配和交换过程。当它完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再生产的循环过程时，不只是一个物质资料的运动过程，而且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例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不论那个社会都有，可是性质并不一样。其原因就是生产关系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要不要依存于消费呢？毫无疑问是要的。不过，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中，生产在

的并不是人們的需要，而是資本家的利潤。这样，生产和消費之間就隔了一道牆。資本家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一只手使生产具有無限扩大的趨勢；由于生产資料和生产品私人占有，另一只手却造成了一个相对狹小的市場，这就是我們所常說的生产和消費的对抗性的矛盾，这个矛盾經過周期的危机和生产力破坏才能达到暫时的强制的統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費的矛盾性質已經根本不同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是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而需要是和消費直接結合在一起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人們要消費它，消費了，又会喚起新的需要，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生产和消費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生产和消費的关系是这样，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也是这样。因此，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理論，一向強調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矛盾的观点上来分析社会总产品和它的再生产过程。

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产品，从价值形式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已經消耗了的生产資料轉移到新产品中的价值；（二）劳动者所消耗的生活資料的价值的再生产；（三）劳动者所創造的純收入。前一部分是原有价值轉移，后兩部分是新創造的价值。

在这三部分价值当中，当年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所創造的新价值，構成一国的国民收入。因此，国民收入是一定期限内各个物質生产部門（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中屬於生产过程在流通領域內繼續的部分）所創造的新价值。按其物質內容來說，是从总产品中扣除已經消耗了的生产資料的部分以外的新生产出来的产品。

在我国，根据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的資料，社会总产品中生产資料消耗的比重，大約占45%左右，其余55%形成当年的国民收入。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国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是很

快的。从1952年到1957年，具体增长数字如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国民收入(亿元)	定基指数	环比指数
1952年	643.6	100.0	100.0
1953年	725.4	112.7	112.7
1954年	756.6	117.6	104.3
1955年	809.9	125.8	107.0
1956年	934.8	145.2	115.4
1957年	980.4	152.3	104.9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合计	4,207.1		

我国的国民收入，1957年比1952年增长了52.3%，平均每年增长8.8%，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个速度和苏联最近五年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接近，但是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的国民收入1939—1949年1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5.2%，1952—1957年期间，平均增长2.7%。我国1957年以前国民收入的增长情况是这样。按照1957年冬天和1958年春天开始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今年国民收入的增长，将打破常规，远超过历年的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使工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4%；粮食增产430多亿斤；地方工业普遍开花，全国新建的省、市、县、乡各级所办工业已达30多万个，总产值8亿元；此外农业社还办了300多万个工业单位，总产值在13亿元以上。从上半年的情况出发，估计下半年工农业生产会有更大的发展，从而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必然冲破一切历史界限，来一个大跃进。

我国国民收入为什么可以出现惊人的增长速度呢？主要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我国的国民收入90%以上是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这些企业是社会主义的，或者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在这里，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相适应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解放，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大增，劳动生产率飞跃上升。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原来的剥削阶级已经基本上失掉了生产资料，他们正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部分人多数已经吸收到物质生产部门从事劳动；过去几年国家行政机关和非生产部门几次精简，特别是1957年干部下乡、上山参加体力劳动以后，相当大的一部分非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加入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农业生产大跃进，全党全民办工业，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大办人民公社和建立工农商学兵的基层单位，管理干部参加生产，使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空前增加，几乎把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吸收进来参加物质生产。

同时，经过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经过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群众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真是“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把一切陈规，旧定额都抛向九霄云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十分之几，百分之几，往往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列宁曾经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与剥削者的盛大节日。民众在其他任何时候

都不如革命时期这样能表现为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創造者。在这样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僧漸进主义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議的奇迹。”我們正生逢这样的时刻。根据1952—1955年的情况，工业（不包括手工业）部門，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国民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70%左右，其余30%是由于劳动人数的增加。今年上半年全国工业职工的劳动生产率約比去年提高24%。估計轟轟烈烈地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大大超过这样的水平。国民收入的增加，归根到底决定于物質生产部門的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主要是从物質資料生产的角度上說的）。这样，生产和劳动躍进了，国民收入的增長也必然出現大躍进的形势。

另一方面，由于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和思想解放。社会主义經濟制度对于資本主义制度說来，具有無比的优越性，是毫無疑問的。甚至連我們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認这一点了。但是，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的优越性是一回事，是不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的优越性又是一回事，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党的领导。毛澤东同志曾經說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設，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种方法是进行得快些和好些，另一种方法是进行得慢些和差些。究竟采取那一种方法，这中間是有斗争的。我們党向来主張，采取前一种方法，而拒絕后一种方法。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和各項政策之所以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化为巨大的物質力量，就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經濟过程发展的这种要求。是的，国民收入是劳动創造的，但是，劳动者不仅是有經驗和技术的人，而且是有思想的人。因此，如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鼓舞起群众的冲天干劲，則不能不靠党的政策、路綫和党的組織作用。这就是我們所常說的，必須政治挂帅。假如沒有这些，国民收入就不可能有現在这样快的增長速度。

从上面的数字看，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是很快的。有了这样的速度，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一定会很快的增大起来。我們可以满怀信心瞻望未来。不过，我們必須看到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总量还是不大的。根据前面所举的資料，1953—1957年的五年內，我国国民收入的总額是4,200多亿元，每年平均840亿元，每人每年平均只有140元左右。毛澤东同志常常說，我們“一穷二白”，在国民收入的总量上来看，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們确实还是个“穷国”。穷，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長期剝削和压迫所造成的經濟落后和生产力低下的結果。这种情况不能不限制我們积累和消費的增加。但是，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毛澤东說：“穷則思变，要干，要革命。”（“介紹一个合作社”）正是这样。为了摆脱穷的狀況，我們的劳动人民有一股古今中外罕見的革命干劲，他們能够旋轉乾坤，改变祖国的面貌，又能够节衣縮食，积銖累寸地把每一分錢用来建設国家，他們的豪迈的口号是“苦战几年，幸福万年”。因此，当我們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安排积累同消費的比例的时候，必須把劳动人民这样一种积极性估計在內。这样，才能充分挖掘积累的潜力，使我們从“見物不見人”的机械論的泥沼里，拔出腿来。

二 积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

国民收入的分配結果，大体上用在两个方面：滿足个人和社会的消費；扩大再生产。前者形成消費基金，后者形成积累基金。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都增長的很快。从1952年到1957年国民收入总額增長了52.3%，同一时期积累基金增長了77%，消費基金增長了40%。

按照1957年的不变价格計算，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国国

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同消费基金的变化情况如下：

單位：亿元

	国民收入使用額 *	消 費	积 累	积累率 (%)
1952年	657.6	627.8	129.8	19.7
1953年	731.7	568.0	163.7	22.4
1954年	757.3	585.5	171.8	22.7
1955年	817.1	640.5	176.6	21.6
1956年	924.4	698.8	225.6	24.4
1957年	969.5	739.5	230.0	23.7
第一个五年計 划期間合計	4,200.0	3,232.3	967.7	23.0

* 国民收入使用額大于或小于国民收入，这是因为国民收入使用額中除包括当年生产的国民收入外，还包括了国民收支差額；同时，国民收入使用額和国民收入总額不变价格换算指数不相同，这样按不变价格表现的兩個数字也有一定差額。

1952年积累率最低。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积累率是逐年上升的。1956年最高，1957年有所下降，但是还高于1955年。总的看来，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积累率不算低。苏联的积累率近二十年来大約維持在25%左右。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如捷克、波蘭、匈牙利）前几年的积累率超过25%；現在已經降到20%左右。至于资本主义国家更不能同我国相比了。他們的积累不仅在性質上和我們根本不同，在速度上也远远落后于我們。美国的积累率1919—1928年每年平均只有10%，1955年是比較高的一年，也不过15.2%。

恰当地安排积累和消費的比例，是关系国民經济发展速度的大問題。它直接体现着集体的、長远的利益同个人的、目前的利益的关系，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之間的关系。这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

首先，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究竟根据什么来规定？积累和消费具体表现为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关系。原则上生活改善是要服从生产发展的，因此，安排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一，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需要是服从于当前的政治经济任务的。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部分的比重比恢复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从1952年的19.7%上升为1956年的24.4%和1957年的23.7%）。同时适当注意了消费基金的增加。当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个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短期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建设速度问题，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提高六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把共产主义的红旗举的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就不能受常规的限制，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便更多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

第二，要根据可能。需要和可能必须结合，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可能，主要看国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和总量，看構成国民收入的生产資料和消費品的比例关系。前面已經說过，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是很快的，这是增加积累的有利条件。但是，国民收入的总量是不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69亿元左右，因人口增加（每年約1,300万人）而增加支付的消費基金需要13亿元左右。余下来的只有56亿元左右，按人口平均每人不到9元。这是一个“底”。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国民收入总量也一定会有惊人的

增長，這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不過，這不等於說當我們安排積累和消費的比重時不要考慮到這個基礎。事情是這樣：如果國民收入增長速度快，總量大，積累率就不妨高一些，因為這樣做也不會影響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國民收入增長的速度不快，總量小，積累率就不能過高，高了對人民生活的改善會有影響，而且對生產發展也是不利的。

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關係要考慮的另外一個可能，是國民收入的實物構成。當馬克思研究再生產的時候，曾經指出，如果不是考慮某一個企業，而是從整個社會的話，就不仅要看到價值形式的補償，而且要看到物質形式的補償。所謂物質形式的補償，就是從那里取得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如何求得積累、消費和第一部類、第二部類生產之間的平衡問題。

事情很簡單，積累基金總是要變為生產資料的；而消費基金總是要變為消費品的。因此，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比例關係歸根到底決定積累和消費的比例。例如，我們要擴大再生產，僅有資金不行，必須有和資金數量相適應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料的增長超過積累基金的增長，會造成生產資料的積壓；相反的，生產資料的增長，趕不上積累基金的增長，就會產生生產資料的供應不足。1955年，由於前兩年農業歉收，加上削減了非生產性投資和計劃的變動，基本建設的規模縮小了，出現過生產資料（鋼材、水泥、木材）暫時過剩的現象。1956年，基本建設規模擴大了，又出現了某些生產資料（主要是鋼材、水泥、木材）供應不足的現象。積兩年之經驗，我們得出了一條結論：積累基金的增長應當同生產資料的增長相適應。

擴大再生產，不僅要求要有增加的生產資料，而且要有供勞動者消費的消費品。消費基金增長的慢，消費品增長的快，會造成積壓，消費基金增長的快，消費品增長的慢，會造成消費品供

应不足。1956年，市場供应紧张，基本建設規模大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多招收了一部分新职工，某些人員工資增加的不适当，消費基金超过了消費品的增長速度。因此，我們的第二條結論是：消費基金的增長应当同消費品的增長相适应。

积累基金的增長同生产資料的增長相适应，消費基金的增長同消費品的增長相适应，是就整个經濟发展趋势來說的。不能把这个趋势絕對化，更不能把人們的活动限制在这个框框里，束縛住自己的手脚。我們必須看到，我們年初安排的平衡总是相对的，在一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生产資料和消費品生产的增長是可变的因素，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增長也是可变的因素，因此，必然不断出現不平衡現象。把这种不平衡現象加以調整，引向新的平衡，正是我們經濟机关的重要任务。

总之，安排积累和消費的比例关系，必須正确地解决需要和可能之間的矛盾，这种矛盾實質上是生产同消費的矛盾。国民收入增長速度和总量以及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生产問題，生产需要和个人消費需要則是消費問題。只有生产和消費的关系安排的恰当，才能兼顧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中，积累基金同消費基金的比例是最根本的比例。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在国民收入数量不变的条件下，积累多了，消費就少；相反的消费多了，积累也会相对减少。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积累和消費，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來說，只有長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差別，並沒有根本利益的差別。消費，固然是直接为了劳动者的利益，积累也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馬克思曾經指出：积累虽然是从一个生产者个人身上扣除的，作为社会成員他还会直接地間接地得到利益。當我們考虑积累率的时候，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积累率究竟應該有多高，它的发展趋势又該如何呢？

前面已經提到，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国的积累率是不算低的（每年平均23%），这样一个积累率是不是高了，象有些人說的那樣，影响了人民生活呢？当然不是。实际上，在积累率提高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不断上升的。在这个期間消費基金增長了40%，平均消費水平提高了28%，就是証明。而且从社会主义建設的要求来看，这样的积累率并不算太高，按理我們应当保持更高一点的积累率。毛澤东同志曾經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經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經濟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節約、反对浪費这样一个勤儉建国的方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所謂勤儉建国，主要是要求把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之于积累，借以扩大再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在积累的問題上可以有兩種态度的：一种态度是政治挂帅，勤儉建国，節約每一分錢用于社会主义建設，“苦战几年，幸福万年”；另一种态度是經濟主义，鋪張浪費，片面強調改善人民生活，降低社会主义建設速度，“圖小利大事不成”。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一向是采取前一种态度，反对后一种态度的。

我們現在的积累率是不是可以再提高一些呢？从工农业生产大躍进的形势来看，这已經是个事实，無需进行討論了。过去，談到积累，我們总是在財政收入上考慮的多，对于群众的积极性則估計不足。其实六亿人口一旦发动起来，千軍万馬，气势汹涌，馬上就会冲破积累率的限界，飞躍前进。1957年冬天和1958年春天以来，工农业生产猛烈高涨，合作社农民大修水利，全党全民大办工业，雄辯地証明了我国的积累有着無穷的潛力。一些資产階級經濟學者，例如馬寅初先生，大叫中国人口多，积累無法增加，工业化沒有希望的謬論，已經被徹底粉碎了。六亿人口不仅

不是积累的障碍，恰恰相反，而是增加积累的决定因素。

有人说：苏联二十几年来积累率都没有超过25%，我們也不能超过，否则会发生危险。我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說法。第一，这种說法对苏联的情况缺乏具体分析。实际上，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积累率曾經提高到33%。現在的积累率虽然是25%左右，但是，苏联重工业品的价格低，如果按照我国的价格水平計算，会超过25%。第二，这种說法对我国的情况也缺乏具体分析。前面已經提到，在我国积累的潜力是巨大的。我們有六亿人口，他們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下，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勤儉建国，勤儉办一切事业已經成为风尚，这就是提高积累率的根本前提。同时，党的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中央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和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針，不仅可以保証国民收入迅速增長积累率不断提高，而且可以保証在积累率提高的情况下，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不致使生产和消費脱节。

还有人說：既然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决定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在我国經濟落后，生产資料生产的比重低于消費品生产的情况下就不能提高积累率。这种說法，有一半是对的。沒有疑問，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应当和第一部类的第二部类的比例相适应，但是，不能把这种关系绝对化。因为在实际經濟生活中，兩者之間也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第一部类的产品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轉化为消費品；第二部类的生产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轉化为生产資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积累基金和生产資料生产的某些不平衡現象，只要发动群众，重点发展，在生产发展过程中是可以克服的。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是社会主义經濟发展的辯証法。

总之，在我国目前条件下，适当的提高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是不可能的，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是不是說，积累率可以無限制的提高呢？或者象有人說的那樣，积累率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的經濟規律呢？也不是的。积累率可以适当提高，但是还是有限界的：第一，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滿足劳动者的不断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生产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用在积累上，必須兼顧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利用一部分来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劳动热情；第二，生产和消費是对立面的統一，生产，归根到底是要依存于消費的，沒有消費，就沒有再生产。同时，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可以轉化为消費，消費也可以轉化为生产。因此，只顧消費不顧生产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消費共产主义”“經濟主义”观点，本質上是资产階級思想的反映。另一方面，只顧生产、积累，不顧消費也是不对的，它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經濟发展的原則，而且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結果会引起生产和消費的脱节，影响扩大再生产的繼續进行，“欲速則不达”。

由此可見，积累率的高低，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要以時間、地点、条件为轉移。在社会主义建設的一段期間，积累率应当高些。一切社会形态为了巩固新的經濟制度，都要經過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建成以后，积累率还是可以增長的（因為我們要不停頓地建設共产主义），不过，那时候就可以比較多一些注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了。毛澤东同志曾經說过：“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現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時間。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儉的原則，但是特別要提倡勤儉，特別要注意節約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內，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計劃的時期內。”（“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冊，第16頁）这一番話可以作为我們确定积累率的原則。

三 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構成

为了发展国民經济,扩大生产,滿足人民需要,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要規定恰当的此例。同时,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内部也要做适当的安排。安排的好,可以保证积累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安排的不好,即使积累率不高,也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因此,在这里我們需要考察一下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構成。

先談积累基金的構成。

积累基金的構成,需要从兩方面考察:一方面从来源上考察,另一方面从用途和周轉上考察。

从来源上考察,我国目前的积累基金可以分为三部分:国家积累;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的积累;手工业合作社、手工业者以及公私合营企业的积累(全行业合营前包括資本家的积累)。根据国家統計局的資料,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三部分积累的增長速度是这样的: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积累基金增長速度	100	126.1	132.4	136.1	173.8	177.2
国家积累	100	137.0	160.7	150.1	160.7	204.7
农业合作社和农民 积累	100	79.0	56.8	71.5	153.1	111.6
其他积累*	100	660.0	525.0	905.0	1,175.0	395.0

* 其他积累包括公私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及私营經濟等的积累。

国家积累具有稳步上升的趋势,1957年比1952年增長了104.7%。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的积累1955年以前是下降的,因为当时农村是农民个体經濟占优势,他們的积累率很低。1955年农